



Crawford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

新闻伦理学

The Ethics of Journalism

中文·英文(双语版)

[美] 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Nelson Antrim Crawford) 著

江作苏 王 敏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

新闻伦理学

The Ethics of Journalism

中文·英文（双语版）

[美] 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

(Nelson Antrim Crawford) 著

江作苏 王 敏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伦理学 / (美) 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著; 江作苏, 王敏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

书名原文: The Ethics of Journalism

ISBN 978-7-5657-2113-7

I. ①新… II. ①纳… ②江… ③王… III. ①新闻学—伦理学
IV. ①G21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1911 号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

新闻伦理学

XINWEN LUNLIXUE

著 者 [美] 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

译 者 江作苏 王 敏

策划编辑 司马兰 姜颖肤

责任编辑 曾婧娴 司马兰

封面设计 运平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40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113-7/G·211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

-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
- 新闻学原理
- 帝国与传播
- 传播的偏向
- **新闻伦理学**
- 个性动力论
- 控制论（第二版）

出版说明

《新闻伦理学》是美国较早提出新闻媒介伦理的著作。

本书作者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强调，新闻从业者应当具备新闻学、政治学、文学等专业知识，各种新闻伦理问题，需要在法律、历史、社会学和文学等领域作进一步探讨。本书还收纳了20世纪初美国各大报纸的媒体规范与条例，于新闻媒介研究者而言，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审查制度较严，学界对于新闻自由和党派宣传的观点稍显偏激，本书的某些表述甚至是不恰当的。为了保持原貌，我们在出版时未作处理。请您阅读时细加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以及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大师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十来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他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了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的著作。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体制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译著还不能算

作科研成果。这也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滋养了年轻学子,使得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的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主编

序言一

The Ethics of Journalism is the first book to work out an ethics of the news media, and its translation is of historic importance to our field. Choosing this book for translation shows an intelligent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 history, and challenges us today to match the quality and depth of this landmark book. The translation is accurate, clear and precise in its content, and thorough in all its detail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ele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make this new book an especially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media ethics scholarship worldwide.

Crawford was the fir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ognize that journalism ethics required a liberal arts degree in journalism or a related field such as literature or political science. He was an award-winning journalist, but he dedicated most of his life to university and college education. The issues in journalism ethics that he emphasized in his book, Crawford saw as requiring further study in law and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d literature. Crawford wanted journalists to ask important questions and identify important issues i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This broad educational framework is taught in this book, and therefore is an inspiration and ideal for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yet today.

《新闻伦理学》是第一本提出新闻媒介伦理的著作，其译作具有历史意义。选择翻译此书，显示出译者对新闻史的睿智理解。并且，这本里程碑式著作的品质与深度，对我们现今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也是一种挑战。所幸，译文在整体把握和细节处理上做到了精确、明晰和规范。选择的睿智和翻译的品质，使得这本新书对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伦理研究卓有贡献。

在美国，克劳福德第一个意识到，从新闻职业伦理的要求出发，从业者应具备新闻、文学或政治学专业的学位。克劳福德是一位获奖无数的记者，却将一生的多数光阴奉献给了大学教育。克劳福德认为，他在书中强调的各种新闻伦理问题，需要在法律、历史、社会学和文学等领域作进一步探讨。他希望记者能发现并提出关于社会和政府的重要问题以及重大议题。这种具有教益的宏大框架，时至今日，依然对新闻理论和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美] 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

2016年3月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序言二

每个问题都有两面，缺一不可

——读克劳福德《新闻伦理学》

新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新闻实践基础之上。1690 年第一篇新闻学博士论文，如今看起来可能还不如现在本科论文的水平，但那毕竟是 300 多年前对新闻实践理性思考的结果，那时在欧洲几个国家总共只有二三十家发行量很小的周报。直到 19 世纪中叶，大众报刊兴起，才奠定了新闻学得以形成的基础。于是 19 世纪末，瑞士和德国的大学出现了新闻学的课程，20 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建立了新闻学的院系。

既然新闻学的初创在美国形成体系，那就必须得有代表作，故 1922 年报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的《舆论学》（*Public Opinion*）、1924 年新闻学者卡斯珀·约斯特（Casper Salathiel Yost, 1863—1941）的《新闻学原理》（*Principles of Journalism*）和美国记者、教育家纳尔逊·安特宁·克劳福德（Nelson Antrim Crawford, 1888—1963）的《新闻伦理学》（*The Ethics of Journalism*）构成了较早的学科代表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批判材料被翻译了出来，有油印本，但人们只能通过批判文章了解这本书的某些被歪曲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直接接触到较新的传播学，反而遗忘了这本书，直到2013年才出版中译本。“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林珊翻译了李普曼的《舆论学》，她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译稿于198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铅印，传播很广，估计印了上万册，以至于1989年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反而卖不动了。克劳福德的《新闻伦理学》遭到冷遇，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内，中国的新闻业不再是一个行业，而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因而也就谈不上新闻职业道德，只需要宣传纪律就够了。直到改革开放后，该书才在一些教材里被提及。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是确认新闻传播业是一个社会行业的最早的职业道德的基础之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漫长过渡，我们没有及时总结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历史的经验，结果几乎重走了美国百年前媒体从职业道德无序到比较有序的历史进程。上世纪90年代我多次提到我国的媒体在重复美国百年前黄色新闻潮的做法，但苦于没有像这本书那样系统的论据来说服媒体遵循职业道德。2003年起至今，我国新闻传播业界持续展开了“三项学习教育”，三项学习的内容之一，便是新闻职业道德，因为落实很不够，至今一再被强调。在这个形势下，江作苏、王敏翻译的克劳福德《新闻伦理学》中译本，便有了现实意义。而我觉得其学术意义应该更大些，因为我国缺乏现代新闻职业道德的传统根基。

克劳福德做过记者，还是多个杂志的主编，一生出版了多本社会科学的论著，并为大英百科全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美国传记词典撰稿。由他来评述美国新闻业的德行和恶行、论证新闻伦理，较为客观并具有学术深度。阅读这本近百年前的书，我感觉好像在讨论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因为那时的许多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规范的事情，在中国差不多都有，甚至为非道德行为辩护的理由都差不多。在这个意义上，我推荐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读一读此书，汲取那时的教训，不要重走美国

同行曾经走过的老路。

这本书的附录 A 是美国当时不同层次和地区的 17 个新闻职业准则文件，包括 1923 年刚制定的美国编辑人协会《新闻业信条》（全国性的），以及 5 个州、9 家报纸、1 位学者制定的新闻职业准则文件。附录 B 是“参考文献选辑”共 83 本（篇），还有各章（共 12 章）篇尾提供的“补充阅读”（共 106 本或篇）。这些历史文献囊括了当时并不多的、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涉及新闻职业道德与规范的文献（论著、相关论著的某些章节、论文、道德自律文件、各种公告和通知）。各章的“补充阅读”+书后的“参考文献选辑”，去除重复的，共计近 100 本（篇），基本集中在作者写这本书之前的 10 年内，包括李普曼的《自由与新闻》《舆论学》和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均是 1920—1923 年的论著。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宝贵历史资料，由此可以研究为什么新闻职业道德问题那时会被提上日程，以及当时人们是怎样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时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以及相关的社会领域，共同为新闻传播业形成职业道德和规范而努力的印记，清晰可见。

我在这里挑一则新闻职业准则谈谈体会，它是克劳福德提供的 9 家报纸新闻职业准则文件中最短的一则，只有 11 句话，作者是 1921—1923 年在任的美国总统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 1865—1923）。哈定 12—14 岁时，在一家摇摇欲坠的印刷所做过学徒。1881 年，他随父亲定居俄亥俄州的马里恩小镇。1884 年，19 岁的哈定与两位朋友筹资 300 美元买下了当地的《马里恩星报》（*The Marion Star*）。这是一份很小的日报，恐怕不比一张传单大多少，报社的主要财产是一架凑合能用、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年内，他从朋友手中买下了该报的所有股份。后来该报成为俄亥俄州出类拔萃的城镇小报之一。俄亥俄州的人不仅喜欢读哈定办的报纸，也开始注意起报纸的老板哈定。尽管哈定曾被评为最差的美国总统，但他办的乡镇小日报《马里恩星报》严格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准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他办报的成功之道：以公信力换取影响力。

该文件前五句和最后一句依次是：

记住：每个问题都有两面，缺一不可（Remember 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 question. Get them both）。

确保真实（Be truthful）。

获取事实。错误在所难免，但务必尽力追求准确。我宁愿要 1 个完全准确的故事，也不要 100 个一半差错的故事（Get the facts. Mistakes are inevitable, but strive for accuracy. I would rather have one story exactly right than a hundred half wrong）。

正直、公正、宽容（Be decent. Be fair. Be generous）。

以鼓励代替批评。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发掘其善而不要对任何人的感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Boost-don't knock. There's good in everybody. Bring out the good and never needlessly hurt the feelings of anybody）。

.....

我希望这份报纸进入每个家庭，而不会破坏任何一个孩子的纯真（I want this paper to be so conducted that it can go into any home without destroying the innocence of any child）。

哈定确定的职业道德第一句用现在的说法即“全面”，同类的表述如当时《堪萨斯城市邮报》（*The Kansas City Journal-post*）职业规范的第一句“每个故事都有两面，报道时缺一不可”（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 story. Get them both）。这个道理不言而喻，但做到全面看问题却不容易。他们都抓住了记者采写时最容易发生的情形：只写自己想到（上级要求）的或只想讲述的一面，这是最为普遍且被人们忽视的不真实。

第二句“确保真实”，这种强调性的说法对正处于美国黄色新闻潮时期（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的报纸主办者来说，没有道德定力是不敢确保的。

第三句用现在的话概括即“准确”。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哈定知道做到准确不容易，但仍然顽强地要求尽可能做到。同类的话还有当时《萨克拉门托蜜蜂报》（*The Sacramento Bee*）的准则第一句话：“宁可失去一篇报道，也不要浪费第二天的时间去更正它”（Better lose an item than make a splurge one day and correct it next）。

第四句是对正直、公正、宽容的要求，这些主要基于人的良心（相当于中国的俗语“人心均有一杆秤”），前两者我们至少字面上熟悉，但“宽容”似乎现在被忽略了，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即不要追求用同一个标准看人视物，容忍多样与多元。

第五句似乎有些像我们常说的以正面报道为主，其实不然，这主要是针对法警新闻的。同类的法警报道案例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而这一句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很现实。

最后一句（第十一句），实际上主要谈的是媒体的涉性涉暴问题，如同当时《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准则文件的第一句“记住，年轻女孩也读《西雅图时报》”。媒体的近半受众是女性、三分之一受众是未成年人，这个受众比例在新闻媒体的运作中和媒体人的实际工作中，其实是常被忽视的。

鉴于中国新闻传播业的起步与美国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克劳福德的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更适合现在的中国新闻传播界借鉴。读这本书，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近百年过去了，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规范的基本原则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还是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全面，以及体现人性的维护公民隐私权、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拒绝广告商对报纸的控制（包括不得把广告冒充新闻）等内容，只是现在的表现的花样更多或更隐蔽了。有鉴于此，这本书提供了认识新闻职业道德的基础。

克劳福德的《新闻伦理学》把美国新闻学形成时期的思想活动，完整、真实地留给了后人。中国最早的学术新闻学论著是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他是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过新闻学的中国留学生之一；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的基本原理直接来自日本，而日本早期新闻学也来自美、英（后来德国新闻学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两相对照，他们很好地将美国新闻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写得颇为中国化。他们的论著在中国最早确定新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自然地融入其中，但没有作为论证主题。这次克劳福德《新闻伦理学》中文版的出版，集中展现了新闻职业道德

理念如何形成、发展的脉络，对新闻理论的框架中补充职业道德这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果梳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新闻传播界遵循职业道德的情形，恐怕基本是一部他律不断加强、自律形同虚设的历史。不要说一些基本的职业理念被做了相反的认识（例如隐形采访被认为是媒体竞争的秘密武器、记者写软文成为基本工作），就是新闻要真实这样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相关党政部门下达文件或行政规章来约束的，自我纠正的情形只有两家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坚持下来，多数媒体没有主动纠错的机制。为什么以自律为特征的新闻职业道德在中国却必须要通过他律来约束？

从克劳福德的论述和他提供的近百本（篇）文献看，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形成的根基是协商精神，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五月花号”公约》，这种协商精神存在于美国文化形成的全过程，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协商意味着存在各种意见，几乎所有美国的新闻职业规范均从具象问题出发，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呈现，没有强行的定论和先验的理念。其中舆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各章提供的“补充阅读”重复率最高的参考文献是李普曼的《舆论学》，李普曼就观察到这一点并很重视。

具象讨论新闻职业道德，不可避免会纠缠于具体实务和缺少超越，因而协商需要引领。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的超越来源于新教伦理，《新闻伦理学》附录A提供的《华盛顿州伦理道德规范》一共15行，听起来像是基督教爱欲和自律的转述。

I will be 我将（做到）

Truthful in News 新闻真实

Truthful in Editorials 社论真实

Truthful in Advertising 广告真实

True to all my Obligations 切实履行所有责任

Honest with my Competitors 诚实对待对手

True to the Ideals of Journalism 践行新闻理想

Mindful to the Value of Sincerity 铭记诚信价值

Faithful to Community, State, Nation 忠于社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

Firm in Publication of Clean News 确保报道透明

Honorable in all of my Dealings 保证业务信誉

Thorough in all of my Studies 调查力求彻底

Unselfish in all my Services 无私奉献

Faithful to all my Friends 忠于朋友

Fair to all my Critics 直面批评

这样的自律传统，在同样新教伦理笼罩的 19 世纪 40 年代的德国亦然。那时德国报纸刊登不真实新闻的情况时有发生，即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报纸也会由于素材符合自己的观点而匆忙刊登各种传闻。马克思曾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普鲁士当局查禁一事写道：“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显然，他对报纸职业道德意识的形成，寄托于德国新教伦理式的自律，后来欧美新闻传播业的自律也确实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

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精神气质差异较大。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协商精神传统，加上后来的革命传统，中国的新闻传播业出现与美国百年前那些新闻职业道德的病症，其解决路径会有不同吗？就新闻职业道德意识的形成而言，中国尚缺少美国的那种文化氛围，美国不是他山之石。但是，既然现在世界新闻传播业已经有了基本认可的职业道德要求，中国新闻传播界只能由各种他律来监督着遵守职业道德吗？

韩国 1987 年通过“6·29”民主化宣言以后，其新闻传播业一下子

就获得了新闻自由，但同时也发生了记者普遍受贿的现象，红包新闻几乎人人难免。那时笔者认为，韩国历史上属于中国的文化圈，新闻传播行业可能就得依靠各种他律来管束，才能遵守规则，内化的自律式道德很难实现。笔者多次询问到韩国访学归来的学者，初期确实如笔者所想象的那样，韩国的新闻红包现象与中国的差不多，很普遍。但最近十多年，得到的答复逐渐相反了，韩国新闻传播业界的红包问题已基本消除。因为韩国社会整体上完善了民主与法治，当社会整体处于民主与法治状态时，新闻传播业作为社会一部分，而且是社会比较彰显的一部分，新闻自律水到渠成，没有谁一再强调，步入了自律的状态。

现在中国的情景，尚处于推进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中，当整体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时，就要求新闻传播业一个行业自觉地遵循职业道德，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谈以上问题，并非说我们无所作为，干等美好未来，而是说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与韧性，从眼下能做的工作做起。例如，翻译出版克劳福德的《新闻伦理学》一书便是一项学术研究方面的基础工作。还要不予余力地反复讲述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从辨清是非做起。不要小看那几个价值判断，现在相当多的新闻传播从业者不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我们要做的，如毛泽东所说，“经常讲，反复讲”。

可能在未来某个阶段，随着中国社会整体民主与法治的完善，新闻传播业的职业道德自律会成为常态，那时我们享受的是一种“它在丛中笑”幸福感，因为我们为此努力过。

陈力丹

2017年4月2日于北京时雨园